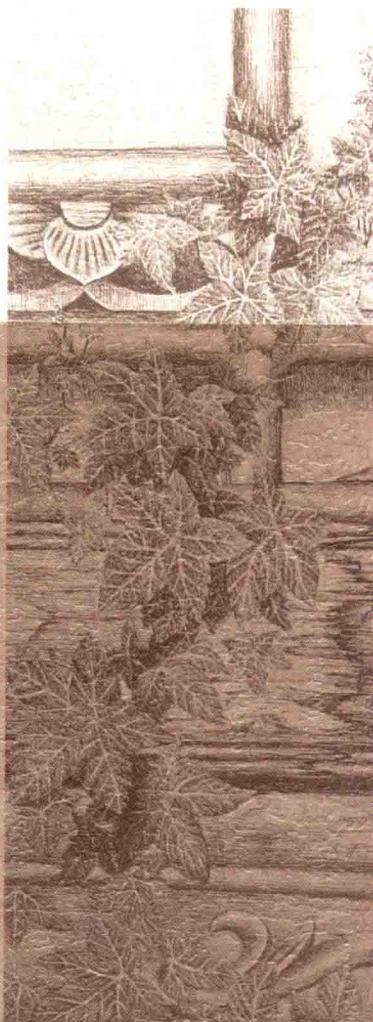


传承与变革

20世纪中国文学散论

高俊林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传承与变革

20世纪中国文学散论

高俊林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承与变革: 20 世纪中国文学散论 / 高俊林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 - 7 - 5161 - 8154 - 6

I. ①传… II. ①高…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20 世纪
IV. ①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985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刘 艳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1.25
插 页 2
字 数 203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文艺评论西北大学基地研究成果

陕西省普通高校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建设项目

陕西省优秀教学团队“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团队”建设项目

陕西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特色学科“陕西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建设项目

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汉唐文化与陕西文学发展研究中心”建设项目

序

虽然关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已经有不少成果，但这仅仅是开始，还有许多问题、许多领域需要继续深入。高俊林的新著《传承与变革——20 世纪中国文学综论》，就是这方面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探索。俊林是一位多读善思的青年学者，他的博士论文《现代文人与“魏晋风度”》出版后受到学界好评。现在要出版的这部新著，虽然还谈不上是对整个 20 世纪中国文学全面、系统的研究，而只是对一些比较重要的作家的探讨和对某些文学现象的梳理，但视角新颖，见解独到，分析精致绵密，读者从书中对“五四”时期文学、30 年代文学、40 年代延安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里比较重要的作家和文学现象的研究中，能够多少看出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线索和脉络来。所以没有问题，这是一本有价值的认真的学术著作。

从五四，从鲁迅开始，这是研究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通例。俊林这本著作也不例外。鲁迅是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整个思想和文学活动都与启蒙主义有着十分密切而复杂的联系。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离开了启蒙主义，是没有办法说清楚鲁迅的。俊林的著作自然也会涉及这一问题，他是从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关系的角度出发谈论鲁迅的启蒙主义思想的。这当然不能说是鲁迅的启蒙主义思想的全部，但确实是鲁迅的思想的重要内容。如何妥善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曾长期困扰着鲁迅。俊林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是有着自己的特点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全面反对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胡适、鲁迅这些人都是主张彻底断绝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的。这种说法当然不符合事实。事实上，正是这批知识分子在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白话文学史》、鲁迅

2 传承与变革

的《中国小说史略》，都是这方面的代表著作。不仅如此，鲁迅的创作也表现出了和中国传统文化深刻而丰富的精神联系。从书中所写到的鲁迅对墨家学说的认同与继承，他的《故事新编》对中国古代英雄人物的塑造，写作方法上对唐代传奇小说的借鉴以及旧体诗创作对中国传统诗歌创作艺术的继承与吸收，都可以看出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联系。除鲁迅外，书中对郁达夫、废名、施蛰存、钱钟书等作家也都有自己的分析。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前人研究较多，俊林的著作则较为细致系统地分析了他的旧体诗创作，是很可以弥补以前研究的不足的。废名的小说创作与中国古代文化联系密切，这一点在过去的研究中被反复指出过。俊林著作的特点在于，更进一步强调了其与六朝文学特别是佛教文化的联系，是很有学术价值的见解。另外，对施蛰存、钱钟书的创作的分析，也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见解，相信读者在阅读中自能体会得到。

40年代的延安文学是20世纪中国重要的文学现象，不仅在当时十分活跃，而且对1949年以后新中国文学的发展路向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文学，就是在延安文学的影响下成长和发展的。因此，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延安文学是绝不可以忽视的，更不能对这一时期文学采取轻率的否定态度，而应该珍惜这一段历史，重视这一时期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它对以后中国文学的影响。俊林的著作所采取的正是这种态度。他通过对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的成就得失之分析，表达了自己对这首诗以及对延安文学的看法。应该说，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相对于习惯上所说的现代文学部分即1949年以前的部分，书稿中谈当代文学的部分篇幅较少，但即使是谈到为数不多的几位诗人和作家的创作，也都表现出作者具有自己特点的研究视角和见解，对人们认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定会有所帮助。读者们读这本书，也一定能够从中受到启发。

是为序。

任广田

2015年11月18日

目 录

第一章 发现自我与认识社会	(1)
一 “我是我自己的” ——“五四”文学中的个性主义思潮	(1)
二 “救出自己”主题中的角色置换 ——《伤逝》与《寒夜》的对比解读	(5)
第二章 鲁迅:一位激进的反传统者的浓烈古典情怀	(11)
一 苦行救世与反抗绝望 ——谈鲁迅与先秦墨家学说的精神联系	(11)
二 在“施之藻绘、扩其波澜”之外的“油滑” ——《故事新编》与唐代传奇文学	(17)
三 “清词丽句”堪比肩 ——鲁迅的旧体诗创作与中晚唐诗风之因缘	(24)
四 鲁迅与《荡寇志》	(28)
五 “争天拒俗”的新文学批评	(35)
第三章 郁达夫:“生活,就是表现的过程”	(42)
一 古典的优雅与从容	(42)
二 “衣冠憔悴客天涯” ——南洋诗作评析	(53)
第四章 废名:从“有限的哀愁”到“渐近自然” ——废名与六朝文学	(59)

2 传承与变革

第五章 施蛰存:在历史迷雾中寻找“新感觉”

——《鸠摩罗什》解读 (68)

第六章 钱钟书:“学人小说”的现代创造者 (76)

一 关于文本 (77)

二 “围城”意识 (91)

三 心理现实主义与智识型讽刺 (94)

四 道德的自律与他律 (100)

第七章 李季:新诗民歌化、大众化试验的一个范例

——《王贵与李香香》的重新解读 (105)

第八章 新时期的几位代表作家 (115)

一 北岛:在语言的丛莽里穿行自如

——读《时间的玫瑰》 (115)

二 墨白:无法抗拒的宿命

——墨白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 (119)

三 野莽:欲望与意志的较量

——谈《少年与鼠》 (131)

附 录 (135)

一 “十七年”的河南小说 (135)

二 “文革”期间的河南文坛 (152)

三 谁在为文言文唱挽歌 (170)

后 记 (174)

第一章 发现自我与认识社会

一 “我是我自己的”

——“五四”文学中的个性主义思潮

鲁迅先生曾经有言“魏晋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乃指其时的文学主创者开始着意为文，文学不再沦为策论、诏诰以及碑诔一类可有可无的赘疣，而显示出了相对独立的意义。之所以称“相对独立”，是因为此后的文学并未真正完全独立，它依然承担着诸如“经国之大业”（曹丕《典论·论文》）、“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序”（挚虞《文章流别论》）、“文以载道”（周敦颐《通书·文辞》）等种种重负，文学自身的发展逐渐呈现出畸形化趋向。这种局面直至20世纪“五四”前后才被完全打破，不仅文学而且文人本身的个性得到了肯定和弘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五四”时代是文人的自觉——“自我”觉醒——时代。

在“五四”时期，受着欧风美雨的浸润，文学中长期遭受压抑的一面被解放出来，要求挣脱束缚、自主自立的呼声日益高涨，形成了一股蔚为壮观的个性主义思潮。个性主义要求个体生命力的存在价值得到肯定，即每一个个体都有其独立性，有其自主权，而不再盲目地屈从于君主、宗族、家长等。用郁达夫的话说就是：“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① 翻开“五四”前后的文学作品，可以发现这种思想已成为主流，一些年轻的作者纷纷热情地赞扬自我，歌颂每一个有其独立生存价值的个体生命。他们热衷于“发现”，举凡天上地下，或尊或卑，

^① 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6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页。

2 传承与变革

视野所及，无不纳入他们的笔端，并为这些“发现”由衷地感到自豪。即使一朵无名的野花、一棵孤立的小草，也会使他们欣喜万分，赞叹不已。正如陈乃棠的《归来》一诗所说：“鹅黄的小花/探头在茸茸的细草之上/是招蝴蝶归来呀！”小花虽小，但她保持着自己朴素的个性，有其生存的价值，也有其追求的价值。它的“探头”、“招蝴蝶”蕴含着无限的生机，象征着自主意识的确立和自我尊严的维护。与之相联系，这一时期的作者们纷纷歌颂反抗，歌颂叛逆，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家长专制，强烈要求树立一个自我的“新人”形象。这个“新人”是在与旧世界的反抗中敢于“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的“天狗”，也是在“满五百岁以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凤凰”，同时还是勇毅顽强、要求熄了象征封建专制统治的“长明灯”的“疯子”，以及发现了“吃人”礼教罪恶、呼喊“救救孩子”的“狂人”。无论他们的行为本身得到了鼓励还是压制，其结果是喜剧还是悲剧，都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都是个性主义思想或隐或显、或浅或深的表现。

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这一时期的个性主义作品在婚姻爱情与家庭伦理道德方面找到了突破口，使得自我解放与婚姻解放、个性解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为在年轻的作者们看来，婚姻的自主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独立人格的确立，没有自由的婚姻，其余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使得他们把火力集中于长期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制度，控诉包办婚姻的种种罪恶，倡导婚姻自主。如淦女士的《隔绝》、台静农的《烛焰》等文均以此为主题，而叶圣陶的《一生》最为典型。女主人公伊15岁嫁到婆家，“抵得半条耕牛”，此后儿子死了，备受丈夫凌虐，丈夫死后她又被转卖。伊“简直是很简单的一个动物”，连做人的权利尚未取得，遑论个性解放了。这就提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主题：妇女解放。从宋元以来，受理学思想的禁锢，中国妇女一直处于受压迫地位，被束缚以“三从四德”等重重的封建教条，使得她们只能是男权社会的凌虐对象与牺牲品。婚姻解放的前提与实质是妇女解放。当时的理论家们也已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指出“在居人类的半数的女性，人格尚不被正确地认识，尚不能获得充分的自由，不能参与文化的事业以前，人类无论怎样的进化，总是偏枯的人类”^①，“必须提高女

^① 沈雁冰、周作人、胡愈之等：《妇女问题研究会宣言》，《晨报副刊》1922年8月1日。

子的人格与能力，使和男子一般高，使成促进社会的一员”^①。因此，鼓吹妇女解放，要求承认妇女独立人格，构成了当时个性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鲁迅所著《伤逝》里的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便是呼吁妇女解放的先声。在此之前，胡适的独幕剧《终身大事》里的女主人公田亚梅给父母留条说“这是孩儿终身大事，孩子应该自己决断”，然后坐着汽车离开，虽然多少有些将婚姻解放与个性解放简单化、漫画化处理，但她毕竟说出了长期以来广大妇女的心声，在当时阴霾重重、闭塞落后的旧中国，足以惊世骇俗，振聋发聩。

在谈到“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思潮时，有许多人总要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将它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相提并论，认为都是对千余年来禁欲主义的一场伟大反叛，都是人的身心的一次全面解放。所以晚年的胡适在忆及“五四”新文学时，也多次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若将“五四”时期的文学与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做一横向比较，就会发现二者确有许多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就是“五四”时代个性主义者的先驱与楷模。无论是郭沫若在《凤凰涅槃》里欢唱道“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火便是火”，还是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里称赞道“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二者在精神上其实是相通的，都是对真正意义上的“人”的价值的重新发现与肯定。但我个人一直有一个看法，即“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思潮远没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影响那么深远，与延续了200多年的人文主义思潮相比，它不仅时间十分短暂，还不到十年的时间，而且其范围基本上局限在知识分子圈内。在文盲半文盲占绝大多数人口的中国，它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在中国，提倡个性主义的知识分子大都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即很难对个性主义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在个性主义的背后拖着个人主义的可怕阴影。这种概念上的游移不定，使他们在诸如个性与共性、个体与集体、自尊与自律的关系问题上徘徊不前，无法得出明确的答案。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中国从来就没有过鲁迅先生所谓的“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站在沙漠上，看着飞沙走石，乐

^① 沈雁冰：《妇女解放问题的建设方面》，《妇女杂志》第6卷第1号。

4 传承与变革

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一类真正的个性主义者。^①当我们翻阅“五四”时期这些作者的作品时，就会发现，他们一方面积极提倡个性，另一方面同时也存在着压制个性的趋向。例如冰心，在其著名的诗集《繁星》与《春水》里，她一方面说：“青年人！/信你自己罢！/只有你自己是真实的，也只有你能创造你自己。”另一方面又说：“墙角的花儿/当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一面要自我发展，自我创造，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孤芳自赏，这两者本来是并行不悖的，可以很好地统一在一起。但在当时中国特定的现实土壤里，却难免要结出畸形的果实，即为了不孤芳自赏就必须时刻自觉或不自觉地压抑个性，发展共性，追求大众的认同。郭沫若于此表现得更为明显，他一边在《天狗》里歌颂自我，歌颂新生，“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一边又在《炉中煤》里自比为一块煤，“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提倡牺牲个性，为了祖国、民族或某一种信念（这种信念随时有被误导的危险，此处不再赘述）而奉献自己，消解个性。这表明，“五四”前后的个性主义者一开始就陷入了一种两难选择：要么发展个性，自尊自尊；要么融合于大众，服从共性而最终泯灭个性。这一矛盾在提倡者本人身临重大的历史关头时往往表现得尤为激烈。最后或者共性消融了个性，使个性主义者本人以丧失个性为代价而在世俗的权力中受惠（如郭沫若）；或者坚持个性，特立独行而付出巨大的代价（如20世纪40年代的丁玲、1949年以后的胡风等）。

总之，“五四”文学中的个性主义思潮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积极作用是有限的。它的意义在于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思想文化的禁锢，旗帜鲜明地要求个人独立和个性解放，从而拉开了从思想和文化上反对封建主义的序幕。“五四”文化的先驱者们所倡导的自我觉醒、尊重个性等思想在今天依然有其现实意义。正如1908年鲁迅先生在《破恶声论》一文中所呼吁的：“人丧其自我矣，谁则呼而兴起？”直到今天，依然是敲响在我们每一个人耳边的警钟。要完成个性解放的使命，需要我们立足现实，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努力奋斗。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3页。

二 “救出自己”主题中的角色置换

——《伤逝》与《寒夜》的对比解读

“救出自己”，不做传统道德礼教的牺牲品，是“五四”一代启蒙型知识分子的共识，也构成了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一个新的主题。在这种情况下，素受歧视、在旧的封建伦理关系中处于最底层的女性自然成为主要的被关注对象。对于这些长期以来默默无闻地承受被侮辱与被损害命运的不幸者来说，摆脱旧式家庭的羁绊、争取恋爱自由与婚姻自主，是她们实现自我解放的主要方式。正如当时一位作者所主张的，“生在此刻中国的女子不但当以大胆与从容的态度处理自己的恋爱与死，还应以同样的态度来引导——不，我简直就说引诱或蛊惑男子去走同一的道路，而且使恋爱与死互相完成”^①。在这方面，有两篇小说为我们提供了最佳的分析个案，即鲁迅的《伤逝》与巴金的《寒夜》。

《伤逝》写于1925年，《寒夜》则完成于1946年。它们处理的是同样的题材，即都是反映了一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婚恋与家庭生活，最后都是以悲剧而告终。如果我们把这两篇小说置于同一个框架里来加以解读，就会发现，在这20多年的时间段落里，旧的礼教思想在新思潮的冲击下，几乎一败涂地：在《伤逝》的时代，封建伦理观念还一度表现出凌厉的攻势；而到了《寒夜》的时代，它已经成了强弩之末。而且，尽管这两篇小说都有着“救出自己”的相似主题，但其中的男女角色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伤逝》中是涓生使懦弱的子君默默地离开，而在《寒夜》里则是曾树生从垂死挣扎的汪文宣身边毅然地出走。这一变化本身也是意味深长的。

如果按照传统小说的安排，《伤逝》与《寒夜》肯定分别难以摆脱男性“始乱终弃”与女性“不安于室”的情节俗套及其相应的道德评价。但现在，在西方启蒙思潮被引进以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反省。这种反省是以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尖锐冲突而展开的，并且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在小说里，涓生与曾树生最终都拒绝了被殉葬的命运。这时的个性主义的确大获全胜，但人道主义同时也隐匿得无影

^① 周作人：《新中国的女子》，《泽泻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无踪。因为当个性主义失却了人道主义的支撑背景后，便不可避免地变成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这样一来，个性主义的胜利就不可能是彻底的，而只能是暂时性的。在个性主义再次遭受挫折的时候，便会很自然地出现人道主义的忏悔。所以，涓生既对子君说出了无爱的真实，又为子君的死感到痛悔，《伤逝》便是以“涓生的手记”的形式所写下的一部忏悔录、血泪书。同样，曾树生也曾毅然决然地出走，却终于在一个冰冷的寒夜里返回故地，孤独地去寻访汪文宣的消息。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这一对在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本是如影随形的孪生兄弟，当它们被原样搬运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代中国社会里，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兄弟阋于墙”的尴尬局面。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鲁迅与巴金的相同之处：他们都接受了西方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而对于中国传统伦理中所谓的温、良、恭、俭、让以及“以忍为德”等表示了极度排斥的鲜明立场。的确，这些都是“吃人”的封建旧道德，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但在新旧转型的特定中国现实里，放弃了它们，同时也就放逐了人道主义；而另一方面，对于人道主义的认同，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与封建道德观念的合流。现代启蒙派作家便是处于这样一种两难的困境。

无论是《伤逝》里的子君与涓生，还是《寒夜》里的汪文宣与曾树生，他们都是在“五四”新思潮洗礼下成长起来的一批新人。他们在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的情况下一同同居，对于传统礼教做出了彻底的叛逆姿态。可以说，他们的最大敌人已经不再是旧的伦理道德，而是新的生活危机。危机的来源一方面固然是现实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此前的他们对于爱情抱持了过高的期望。他们并没有把爱情看成是独立的，而是在它上面寄托了过多的东西，使得爱情本身不堪重负、艰于行步。当爱情并没有伴随着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一切时，爱情便让他们产生厌倦，并最终感到失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是反思爱情本身，而是将一切归结于施爱的对象，并很自然地把与对方的分离看作是自己迈向新的生路的第一步。在涓生的眼里，子君已经失去了一个志同道合者共同战斗的志趣，而完全沦落为一个有着极强依赖性的家庭主妇：她不再看任何书籍，而以待弄小油鸡与阿随为主要的事业。所以涓生以为，“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于曾树生而言，现实生活中的丈夫既然只是一个懦弱无用的老好人，她便自然要时时发出“为什么还要守着他”的自我责问。这样，因美好的理想而结合的婚姻，最终又会因现实的冷酷而被毁掉。这实际上是

困扰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例如，在同一时期叶圣陶的一部长篇小说《倪焕之》里，男主人公倪焕之也表露了相同的失望，在与金佩璋因相恋而结合以后，他便深感“有了一个妻子，但失去了一个恋人、一个同志”的寂寞与痛苦。

应该说，涓生与曾树生并不缺乏严格的自我反省精神。是救出自己，还是跟着一起沉落？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选择。他们的灵魂在理想与现实发生龃龉的情况下，充满了种种的犹疑与挣扎。因为在严酷的现实条件下，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永远都是那么的紧张，不容有多少人道的选择。在救出自己身体的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灵魂的沉落；而放弃任何一方都意味着要付出相应的惨重代价。涓生认为：“只要能够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了她。”在极度的困窘中，他认识到“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所以，当看到子君“磨炼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思想，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之后，他终于不愿苟安于虚伪，而对子君说出无爱的真实，“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同样，曾树生意识到“她应该飞，她必须飞，趁她还有翅膀的时候”。对于她来说，她的翅膀不是别的，正是她的青春、她的充满了活力的年轻生命。她“爱动，爱热闹”，“需要过热情的生活”。尽管她曾经有过理想，也有过为理想而工作的勇气，但现在“只想活得痛快一点，过得舒服一点”。诚然，她在内心深处也有过“我为什么就不能牺牲自己”的自我谴责。但另一方面，她觉得自己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需要幸福，我应该得到幸福。”应当说，这是一种并不过分的要求。因为不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她都没有得到满足：物质上的匮乏与精神上的贫瘠，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在曾树生看来，她与汪文宣现在既不同志也不同道合了，“他们睡在一起，心却隔得很远”。她对于汪文宣只有同情，在同情里夹杂着一种恨铁不成钢的遗憾：“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了你这种人造的。你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在被依附者这一方，爱情已然消逝，而对于依附者的一方来说，他们的爱情依然是那么深挚。生活中的子君与汪文宣显得懦弱，他们缺乏行动的力量，但他们并不缺乏爱，以及为这种爱所奉献出的一切。相对于涓生与曾树生来说，子君与汪文宣都表现出了强烈的自我牺牲品格。这种自我牺牲品格其实依然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之上的。子君在离开时，将两人生活材料的全部都留下来，在无言中让涓生借此去

维持较久的生活。汪文宣也在贫病交加中，还不忘预支一部分薪水来给妻子买生日蛋糕。对于对方的爱，几乎构成了他们自我生活的全部内容，是爱支撑着他们顽强地生活着。可以说，爱情就是他们的宗教，为之他们献祭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虽然严酷的社会现实是导致他们不幸命运的根本原因，但谁能说得清，在他们个体生命的消亡上，对方无爱的冷漠是怎样构成了最后的致命一击？

子君与汪文宣并不是天生的弱者，他们只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儿，是时代造就了他们，时代让他们变得懦弱。子君曾是一个勇敢的新女性，她与涓生一起“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也曾经说过“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豪言壮语，却终于还是一个依附者。她为从庙会买来的叭儿狗起名为“阿随”。随者，随顺也，正是封建婚姻道德中的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之意。涓生自言“不喜欢这名字”，也是出于对这种依附思想的不予认同。但于子君而言，在如此现实情境下，除了扮演这种依附者的角色外，她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出路？汪文宣也曾经“脑子里满是理想”，要投身教育事业，兴办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却终于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低下了自己高贵的头颅。他的崇高理想，不仅没有使他摆脱困窘的生存状态，反而成为他在这个冷酷无情的社会里获得世俗幸福的最大障碍，它阻止着他向世俗沉沦。即使真的沉沦，也不会那么心安理得，而注定要伴随着痛苦的自我反省与不断的心灵煎熬。他的温顺善良，也使他在现实社会中只是一个无用的老好人、一个现代中国社会里的“多余人”。他对着母亲抱怨说：“我们没有抢过人、偷过人、害过人，为什么我们不该活呢？”他到死也没有明白：在这个弱肉强食、巧取豪夺的社会里，正因为他没有抢过人、偷过人、害过人，所以他才不该活。汪文宣的悲剧，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是具有代表性的。在写于30年代的《家》里，巴金批判了觉新的作揖主义，让觉慧勇敢地出走。然而谁能保证，在严酷的40年代，在沉重的生活压力面前，早年追求理想的觉慧不会成为另外一个汪文宣？

子君与汪文宣诚然都是依附者，但在冷酷无情的社会现实面前，谁有权利去谴责这种依附？社会又从哪些方面为他们敞开过可以不去依附别人的道路？即使是为汪文宣所依附的曾树生，又何尝不是别人的依附者？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娜拉走后怎样》

的著名演讲，对“五四”以来蔚然一时的女性解放运动提出了质疑。面对的是受过新思潮洗礼的新女性，讲的又是与女性解放有关的话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倘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子君与曾树生都勇敢地 from 封建旧式家庭中走出，走进了自己参与组建的新式家庭，最终又在社会因素与个人因素的合力下被迫离开这个新的家庭。子君是回来了，最后走向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曾树生也一度回来了，却发现自己已是无家可归，而终于又一次寂寞地走出。在那样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她能到哪里去呢？她最大的可能依然是飞往兰州，去依附那个陈主任。但出于物质的煎熬而去过那种无爱的生活，则无疑是一种堕落。她只能和涓生一样——“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来做我的前导……”

我们很难想象涓生与曾树生以后在勇敢面对生活的时候，还会不会同时勇敢地面对自我，面对那些隐藏在自我灵魂深处的过去的阴影。尽管他们可以选择“遗忘和说谎”，但说谎也许十分容易，遗忘却未必那么轻松。涓生希望真有所谓地狱，在孽风怒吼中寻觅子君，当面说出自己的悔恨与悲哀。而这种悔恨与悲哀又是什么呢？——为了已经丧失了的爱做出虚伪的承诺吗？还是一如既往地为追求真实而将痛苦与死亡给予对方？至于曾树生，虽然她最后似乎又鼓足了勇气，自言“会有时间决定的”；但环境的残酷依然是那么真实，黑暗与寒冷无所不在。而且新的生路在哪里，她并没有考虑清楚。她和涓生一样，更大的可能是，选择了对于世俗的迁就。也许他们最终有机会成为生活中的胜利者，但同时也是自己早年理想的失败者。就像鲁迅另一篇小说《孤独者》里的魏连殳一样，在理想碰得头破血流之际，终于向世俗举起了降旗——“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如果以文本阐释的方式来考察社会，从《伤逝》到《寒夜》，这种在“救出自己”的主题下所发生的角色置换，是否意味着女性强势话语的出现，而男性话语则相对萎缩于边缘地位呢？答案显然并不是那么乐观的：因为曾树生只是从一个男性的阴影里走出来去依附于另一个男性，在根本上并没有摆脱这种依附性的角色。正如巴金后来所指出的，“曾树生一直坐在‘花瓶’的位子上，会有什么出路呢？她想摆脱毁灭的命运，可是